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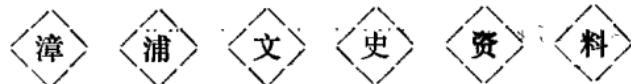
13.6



内部刊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漳浦县委员会 文史工作组编



新第五辑 目 录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浦浦县召开“黄道周研究学术讨论会”	(1)
论文 师严弟敬——门人笔下的圣贤黄石斋	黄典诚(1)
选刊 热情扶植开来世的人才与学术	叶国庆(5)
~~~~~革·命·历·史·经·济·篇~~~~~	
苏维时期的车本乡合作社	吴运琳(8)
革·人 杨飞传略	杨其秀(9)
革·命·物 蓝田同志生平	石磊(10)
~~~~~·民·国·时·期·史·料·~~~~~	
国民党漳浦县党部的演变	陈育嗣(12)
漳浦“补正地粮”与县长黄明日被撤职案	李林昌(15)
“焦土抗战”与漳浦	董冬(22)
·科·技·史·话· 野生的“芦葫丁稻”竟是世上宝	阮仲铭(24)
· ~ 经 ~ · ~ 济 ~ · ~ 编 ~ ·	
蔗糖史话	陈万年(25)
解放前漳浦粮食工商业概况	胡晋才(30)
南溪下游大埔的碾米行业	林明庆 林琳(34)
漳浦盐史	李林昌(37)
今日盐价	邱文才(45)
漳浦铅矿的“发现”	陈万年(50)
漳浦纺织业的兴衰起落	李林昌(52)
在台湾久享盛誉的漳浦菜籽	桂林(55)

- 漳浦第一条公路——浦镇路的诞生 阮瞻仰 郭祖柴 (56)
从“滨海汽车公司”到“浦雷公路” 李文章 (57)
漳浦人与龙溪公路 陈旺寿 (59)
- 问题探讨 • 漳浦赤岭畲族来源探讨 李林昌 (63)
• 华侨史 • 漳浦早期的华侨 陈万年 李林昌 (68)
• 历史人物 • 陈山过台湾 林曼容 (72)

- “开漳圣王”的副将许天正 文昌 (73)
鸟石荔枝的鼻祖林功懋 廖秉章 (75)
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蔡世璠 张兆基 (77)
乾隆相国——蔡新 张兆基 (81)

- 古雷今昔 漳川 (88)
我国东南沿海最优秀深水港址漳浦下垵 严利人 (90)
陆鳌——昔日海防重地 漳川 (92)
今日陆鳌 郑益官 (94)
旧镇与旧镇港 漳川 (96)
编后话 (9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浦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编

封面设计：高少革

刊名题字：徐柯楠

漳浦县召开“黄道周研究学术讨论会”

一九八五年三月九日，明朝著名学者黄道周的家乡漳浦县举办了一次“黄道周诞辰四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召开了为期三天的“黄道周研究学术讨论会”。本省著名学者、教授，各地学术团体代表数十人应邀参加，递交论文，踊跃发言。这里选择黄典诚教授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叶国庆教授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师严弟敬——门人笔下的圣贤黄石斋

在漳浦黄道周诞辰四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黄 典 诚 ·

十年浩劫之后，被破坏了的师生关系还没有彻底恢复过来，这是社会主义祖国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损失。我每次翻读宁化李世熊的《寒支集》，看到他那无处不悼念他的晚年之师黄石斋，无处不表彰他的殉国之师黄石斋，我总觉得象黄李那样的师严弟敬，确是可以典型百代的。因此，我早就想从《寒支》一二集中，录出有关黄石斋的一切材料，略按年代，汇为一篇，以便人们的观摩和学习。但因专业任务不在此，也就延搁未加动笔了。

今年（乙丑）二月初九日是先哲黄石斋诞生四百周年的纪念日。漳浦县人民政府来向我征文，我当然义不容辞地应承下来。於是焚膏继晷地完成了这份材料。

这份材料都辑自《寒支》一二集。《寒支集》的作者是宁化李世熊，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3）九月二十日，享寿八十五岁。世熊字元仲，号寒支。他是个神童。十岁时，就会应塾师命，为其手中扇作破题句云：“舒之风

动四方，卷之退藏山密”。可他一辈子不得志，他的经历是当胜朝多故之日，际身世离乱之秋。十冠诸生，九蹶场屋。目击夫时事之日非，心痛夫当道之失策。欲退则心不能忍。及至河山易位，人物失伦，欲哭则不敢，欲泣则近妇人。欲死则二慈在堂，相依为命。当尔之时，如失路之儿，丧巢之鸟，徘徊怆恻，视星如昏。”真是久处幽篁，不见天日的了。

李元仲是个文章饱学之士，自言“少时不蹈绳检，好为驰骋无涯之文，已又一变为沉深寡妙之文。”他早就说过当代没有孔夫子，我不应当做任何人的学生。这口气多大啊！可他到了四十三岁，忽然向黄道周叩了头当了晚年的学生。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读了黄氏的《三易洞玑》，读来读去，总觉得迷津惆怅，毫无所懂。至此，他才悟到：天地间还有一种依得他学习的人，典籍里还有一种叫他读不懂的书。他不得不向黄执贽及门称弟子了。

真的，李元仲的心目中，黄石斋无疑就是当代第一大圣贤，是从几件往事的回忆里涌现出来的。

1、黄石斋用直言激怒了崇祯皇帝，崇祯下狠心叫黄受“廷杖”（明王朝对臣工最残酷的刑罚）并把他逮下诏狱。这当然居然有个大学生涂仲吉从闽南走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去为黄石斋上书喊冤枉，抱怨皇上对于逆耳的忠言比不上汉唐之君的圣明。崇祯勃然大怒，也把这个书生逮捕送诏狱。为追问唆使人，这个书生被拷打到死去活来，但他还指着胸脯说：“我只是为大贤鸣冤，心肝是纯洁的，可以剖开送皇上查验。”皇帝听到了这话，也为之戚然动心。

2、有个姓何名楷的名士，初到北京，到厂甸一带去踏足，看了满目琳琅的古董，很想买它几件玩赏，无奈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也就终日抑郁，闷闷不乐。等看到黄石斋受了皇帝毒打之后，血肉模糊地关在诏狱里，还若无其事地伸纸执笔写他的《易象图》《孝经注》；回头再看那些古董彝器，竟同尘土一般。于是他说出了“人不可不学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3、稍后，黄石斋被贬到江西，为免除他的诸般痛苦，有一个青年学生名叫彭这生，竟然倾家荡产为他联络监押的武装大监们，后来又一路照料保护，直到维扬地界，才动哭拜别。

4、黄石斋在江西被捕，有地方绅士官员拿出一千两的银锭要赠与他。他断然拒绝了，一路上，只有两个脚夫替他挑着破烂的被包和装满《易》经的抄稿跟纸墨砚等文件书籍。驿馆的官吏差役们看到这种情形，无不衷心感动，一齐包围着他，争先下拜，并称赞说：“真是圣人！真是圣人！”

5、当初有个官居银台的尚宝太仆正马公，看到黄石斋得罪崇祯了，性命危在旦夕，赶快上表营救。皇帝认为马是黄石斋的同党，一怒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马的夫人深明大义，就对马说：“好人是国家的栋梁；栋梁断了，屋子还不倒吗？”于是夫妇相约，隐居起来，宁愿安度平民的生活。

6、黄石斋在福州，客人访问他，学生侍候他，每当人们请问他的事——如武陵杨嗣昌的问题时，他总非常客观地象谈汉唐历史一样。作了非常深入地具体分析，是是非非，让人一听，就异常清楚。他的谈吐之蕴藉，真够人体会无穷。学生们和他一比较，总觉得肤浅躁率，不啻有天渊之别。

7、黄石斋有四个儿子，名字都带了鹿字旁，学生都感到奇怪，但又是不敢问他。过了一些时候，李世熊才开口请问：“黄老师，公子们的名字都带了鹿字旁，是不是有取于希望他兄弟接连中进士，赴了鹿鸣宴，并在圣明的朝廷做了官？”黄石斋非常严肃地说：“错了，只是让他们跟山猪野鹿做伴儿就是了。”

等他上车要到南京去，学生都依依惜别。他就安慰大家说：“快别这样伤情，要不了半年，咱们还会见面。”这是甲申十一月的事，哪知明年乙酉五月，他就随着唐王来到福州。事态发展，完全不出其料。象这样的倒子还多的很，他凭《三易洞机》的高深学识，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李世熊对于黄石斋，是真从心底里佩服他。因此李生对于黄老师的爱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黄石斋孤师出征，他恳切上书多方劝阻，希望老师能留太有作为于将来，不作无谓牺牲于目前。但是老师以为处处受人（指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钳制，不如战死沙场，也好表示须眉丈夫一心为国的气概。

后来黄石斋战败婺源，成为南冠之囚。最后杀身成仁，为国牺牲。福州方面，竟然“上无震悼之诏，下无诵忠之书”。李世熊出于维护老师的义烈，就向隆武上了《褒恤孤忠疏》，极言朝廷若不表彰忠烈，国难当头，将何以劝激励臣民？同时李世熊预料到，为国牺牲的黄道周若不受到朝廷的褒恤，便将受到小人的诬陷。什么懵懂不知军事啊，迂愚自以为是啊，轻生无济于国啊，都将会接踵而来。他郑重提醒朝廷要加以深切注意。最后他说：不要说黄道周为国牺牲了，不可忽略，就使他老寿善终，也应该受到千秋俎豆，永垂不朽。这是为什么？原来黄道周是自孔孟以后，传承圣学少有的大儒。

不但这样，他还建坛遥祭，赋诗悼念。诗的内容是：

正是太明中兴的时候，

先生坚持苦节毅然出兵。

无米之炊鼓动不了王军的勇气，
下足决心，只求先帝了解我的忠精。
完全绝望的局面，人才再好也没用；
牺牲没啥用，毕竟不愧大丈夫的名称。
武夷山的仙掌峰和幔亭峰还安然无恙，
它们好象还在懊悔让你出山去牺牲。

李世熊还恋恋不忘于为黄石斋树碑立传。但他认为象黄石斋这样的当代第一人，必须要有当代第一手笔来替他写传记才相称。另外一个学生郑牧仲虽已替黄写了一篇《文明公传》（隆武给黄的封号叫文明伯）。李世熊今天读，明天读，发现文章虽然备极推崇，但遗漏和不恰当的地方还很多，不免使人很失望。那时李已是八十以上的人了，自认要学习班固写《汉书》的本领，追赶司马迁写《史记》的事迹，已万万不可能了。他只寄希望于未来，他认为文天祥写进了《宋史》之后，自元到明，还不断继续补写。郑牧仲的《文明公传》虽然还难满人意，但他希望这是第一篇，将来一定还有更好的第二第三篇连续写出来。

我们介绍了弟子对于黄石斋崇的一面。也不要忘掉黄石斋獎勵学生的一面。当十七岁的李世熊第一次拜见黄石斋的时候，黄石斋就很重视他。称赞他说：“年轻有志，这样勤学下问，真是后生可畏，令人惭愧！”等到二十六年后世熊正式拜他为师，他对李又表示非常器重。乙酉七月初一，隆武称帝于福州，黄石斋进了内阁主持政府的工作，首先就推荐李世熊任中翰之职，李谢不应。八月，又把李世熊的名字附上《对进表》，准予出貢参加廷试；李只向学院投宿，也不应试。黄石斋不但不责怪他，反而默默赞许他。

黄石斋对于其他学生也是每有优点，便加赞赏。如福州林守一善作诗，黄石斋称赞说：“守一葱倩高秀，每与共砚，辄思焚笔。”又说：“奇思警言，每出韵象之表！”因此作了长歌五百字送林。林感念师恩，在老师为国牺牲之后，曾要求到南京去收拾他的骸骨，送还漳浦安葬。事未成，志则可嘉！在纪念黄石斋诞辰四百周年之日，我们辑成了这一集第一手材料，给公开发表出来，这对于第一手写的第一人传记，应该也有参考价值吧。

——编者注：黄典诚教授辑录的资料一万多字，经漳浦县文化局印刷，于黄道周学术讨论会上分发，本刊因篇幅所限，不能全文刊载。

热情扶植开来世的人才与学术

黄道周学术观点之一

~~~~~·叶国庆·~~~~~

黄道周在明代是一个学问渊博、言行卓特的人，他的学行对当时及后世发生深远的影响。论述我国文化和历史，对黄道周的著作及其生平经历，应如何阐述其思想论著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是有利于后人钻研的。选择某方面问题，作为专论以取得深沉透彻的了解，是有必要的。黄道周针对当日的政情和学风，提出了调正学风和培养人才是治国安天下之要事。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可以看到当时政治和社会上的症结所在，也得以理解黄道周在学术思想上所高瞻远瞩的是什么。本文对此问题试作一探索，以就正于诸位同志。

黄道周生当十七世纪即我国明季时代，当时在国内经济和政治酝酿着剧变，在国外西洋的经济势力和科学影响，也波及中国。黄道周从自身的阅历，考察时势的需要，据其见解，提出处理问题的要旨。他认为目前扶正学风培养人才，是治国平天下的要事，是应付时势的关键一着。

对于当时政教，黄道周看到四方兵荒马乱，“民力已竭”<sup>①</sup>。在朝廷上则权奸操柄，“指鹿为马”<sup>②</sup>。执政者加赋实边，严法重刑等等措施都无济于事。<sup>③</sup>讲到当时人情习气则是“风教惟颓，流传邪鄙”。虽然当时帝王“焦劳于上”，群臣“修省惕厉”，但皆抓不到要着。<sup>④</sup>最主要应抓的是什么？道周认为：

“天下之衰弊，生于人材，原于学术”

“天下之强弱，视于人材，人材之邪正，视于学术。……<sup>⑤</sup>国家的治乱或盛衰，关键的问题是人材和学术，而朝廷上下没有重视此事，虽然有时也提到，但方向错了。道周说：群臣虽说要“振衰起弊”，但是“邪正是非，去取之间，未有定论；人才学术未有正响。”<sup>⑥</sup>当时用人，重用“簿书刀笔”之士，“谗谄相先，恶直丑正”，而不了解“人材之邪正，视于学术”，不重视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术是什么？学者要学的，应当是：

“有以开来世之学，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维宇宙之治化”<sup>⑦</sup>这样  
的学术是博大精深的，在十七世纪时代，不可能有“开来世”或“匡维宇宙”之  
学。但从这里我们看到黄道周在学术上的高瞻远瞩，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他认  
为人才学术是前人“仰钻劳心，俯铁苦行”，<sup>⑧</sup>经历万劫得来的。

真正的学术乃“据自然之理而构成的，用当时的词汇说，乃依据‘天地之  
权衡，万物之纲纪’而造就的，是结合天人之智而造就的。道周认为孔子讲的  
学“以诚明为本，诚出于清，仁出于诚。”“清”从何处来呢？道周说“清为  
天之淑气”<sup>⑨</sup>，人各秉淑气，各得其清。人秉清气，其一举一动概以仁义为依  
归，因为“体清则仁立”，“仁为天之本心”<sup>⑩</sup>，所以讲“诚明”，是本自“上  
天之精神”和“圣人之妙用”。这是从天人合一来作说明的。所以真正的学  
术，其本在“清”。道周说“以清为本，清则其性情清，学问亦清；衡鉴清，  
流品亦清；伦叙清，纲纪亦清”<sup>⑪</sup>。这就如上面所说“体清则仁立”。我们讲的  
仁义，不是从书本中提出的，而是据自然之理，即“仁义是天地之权衡，万物  
之纲纪”。所以要审查人才学术的邪正，要以仁义为准，“量天下之人材，程  
天下之学术”<sup>⑫</sup>。就人才说“杀身而利于人谓之仁”，“为义而言之谓之正  
言”。真正的人才，“培养甚难，摧折甚易，十年不成一贤。”怀抱这样看  
法，黄道周爱才甚于保身，竭力推荐人才，培养人才。他赞扬东林党人的师友  
刘从周是“道贯高坚”的学者<sup>⑬</sup>，称赞几社领袖陈继儒“博学多通”<sup>⑭</sup>。他几  
次舍身“以血肉裹仁义”救护正直的士大夫。他自身也取义成仁而舍生。为了  
培养人才，他到处讲学。他在漳浦明诚堂，在漳州紫阳书院和鄞山三近堂，在  
浙江大涤山书院，都曾讲学，接见从四方来的生友。

看黄道周的着力点，可知他了解到文化智识具有巨大的威力，能为人类造  
福。他说真学术“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维宇宙之治化”，学术的力量多  
大呵！所以他一言一行必依据学理。再如他认为人人秉有天之淑气，即清  
气，所以他说“古今学者皆可以为圣贤，…古今圣贤皆可以为尧舜”<sup>⑮</sup>。这样看  
法，乃打破旧儒家“上智下愚”的观点。人人“可以为圣贤”，是一种平等  
观。和道周同时人黄宗羲也曾说，治天下好像若干人共施一条大本，君与臣共  
曳本之人也”。<sup>⑯</sup>这观点乃把“君”拉下来和“臣”处于同等地位，这也是平  
等观。黄道周所称“开来世”之学就指这一类的，具有启发文化的意义。

有一点还可以说说，藉此来了解学术的威力。明亡之后，清帝对于抗清士  
大夫，视为叛逆，或杀或囚，少有幸免。但对黄道周却称赞他为忠臣，允许入

祀乡贤祠。清廷修编《明史》称赞黄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这就表明黄道周的学行，在其身后尚为时人所尊重，清廷想掩盖他也掩盖不了，不得不称道他为忠臣。黄道周说学术“有以匡维宇宙之治化”，正说明某些学术观点对文化思想有推进的作用。

1985年2月作

注：

- 1、《黄漳浦集》卷二，拟论杨嗣昌不居两丧疏。
- 2、《黄石斋书牍》下，答郑元岳。
- 3、《黄漳浦集》卷一，辨仁义功利疏。
- 4、《黄漳浦集》卷二，慎喜怒以回天疏。
- 5、同注（3）
- 6、同注（3）
- 7、《黄漳浦集》卷三，退寻仁清之旨疏。
- 8、清·庄起侍《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
- 9、同注（7）
- 10、同注（7）
- 11、同注（7）
- 12、同注（3）
- 13、《黄石斋尺牍》下，答刘念台。
- 14、《黄漳浦集》卷二，三，罪四耻七不如疏。
- 15、同注（7）
- 16、谢国桢编《黄梨洲学谱》三、著述考。

# 苏维埃时期的车本乡合作社

吴运琳

车本位于靖和浦三县交界，是一个只有二十八户人家一百多人口的边远山村，是我县最早建立的革命据点村之一。一九三四年靖和浦边区的车本、山城、龙岭、后寨、三坪等十三个乡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烧田契、分田地，贫苦农民喜气洋洋。此时，闽南特委和靖和浦中心县委机关都住车本、后寨，后方机关看守所、军医院、军衣处、枪械修配厂、兵站设在车本大山。车本成为闽南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伪中央军八十师，伪保安团马高兴部及地方翁猪母、吴玉如反动民团武装配合“围剿”我靖和浦边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在苏区周围集镇派便衣侦探站岗放哨，严密检查赶集群众，并禁止小商贩到山区做生意，企图以此断绝苏区人民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苏区的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闽粤边区特委一方面集中红军游击队武装，配合地方工作人员，消灭反动武装力量，开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一方面领导车本、后寨、三坪各个苏维埃政府成立合作社，通过各种渠道取得生活用品的供应。

车本乡合作社是三四年十月在靖和浦中心县委辖下的第三区委领导下成立的。乡党支部副书记吴文焕、乡经济委员会主任吴头任正副经理。他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把粮食、家具、猪、牛及一切用品搬上山搭寮居住，“坚壁清野”，赤卫队负责站岗放哨，敌人来了掩护群众上山，敌人去了就通知群众下山劳动生产，解决粮食蔬菜的困难；另一方面动员群众筹集资金，即入股份办合作社，一股一块银元。群众入股数量不等(大约一至五元之间)。车本二十八户入股三十八股三十八银元。乡苏维埃政府也拿出二十五银元，合计六十三银元作为铺底资金。物资来源是靠车本外围的大坪、串内、山坪顶、长兴、石古、后坑寨、后埔、崎溪、上营、陂头等游击区的群众，到小龙溪圩、石榴坂圩、象牙圩、漳浦县城等地分做购买。也利用小商小贩代买一部份，然后由乡苏维埃政府派人运回车本。由于敌人常来袭击，条件极端困难，不可能建立固定售货

点，所以把物资藏在山洞里，而后搭寮设点供应群众和机关的工作人员。物资供应也没有固定时间，这里卖一天，那里卖一天，中午时最热闹。群众买到盐、火柴、糖、烟叶。都十分高兴。物资供应品种很多，有棉布、毛巾、雨伞、牙刷、手电、电池、肥皂、油、盐、煤油。还有中草药、米粉、杂菜、罐头、盐鱼干等。每一星期还想办法杀一头猪供应群众和机关。

中心县委书记何浚经常到合作社检查工作。有困难及时帮助解决，特委经济委员会主任许义山同志也经常到合作社了解物资供应情况。有些物资，如西药，卫生衣、油布、鱼罐头、鞋子等，合作社开清单派人去洋坪交通站通过群众到漳州市购买，然后由交通员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运送到白云交通站，再叫当地群众运回车本山。

本本合作社记帐员吴木连、管理经济副经理吴头，采购员吴石降、吴红雷，售货员，保管员吴厚卜、吴同、吴金榜等人，都是乡干部和赤卫队员，他们在合作社的工作是义务的。合作社每月盘点一次，盘点后帐目向群众公布，群众反映很好。

合作社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夏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但却对苏区人民和红军游击队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楊◇◇飛◇◇傳◇◇略◇◇~~~~~

### 杨其秀

杨飞字岐鸣，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东门兜人。生于1915年，卒于1969年，年53岁。出生于地主家庭，年少好学有志。1936年就学河南大学时，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国难深重，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赣州地委、鞍山钢铁厂厂长、武汉钢铁厂书记兼厂长、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书记，昆明工学院院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时，杨飞于1969年6月11日屡受批斗折磨致死。后得平反昭雪，悼词中有“是中共好党员、好干部、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荣称。

杨飞在抗日战争中和靳增珍结婚。她现为离休干部，曾任赣州市宣传部长、昆明冶金工业学校书记等职。有儿子杨新惠、杨滨生、杨南生等三人。

杨飞平生廉洁奉公，没有遗产。骨灰安置于昆明市烈士公墓。

# 蓝田同志生平

石磊

蓝田(1915.9—1958.2)，原名蓝长汀，福建省漳浦县和坑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1928年在和坑养正小学毕业，先后在厦门大同中学、双十中学读初中。他自幼聪敏，勤奋好学，求知欲强，读书如饥似渴，在校学习成绩优秀。

1931年考入厦门大校附属高中，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义愤填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更加痛恨，遂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曾两次随厦门大学请愿团赴广州和南京，强烈要求两广政府和南京当局出兵抗日。1933年转至上海立达学园读高中，因父病故奔丧，不能回原校就读，后旁听复旦大学课程，并自修德文。其间曾接触到思想进步的同乡尤树铭、王孝恢、张雨霖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阅读进步书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进步很快。

1936年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同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踊跃参加抗日宣传，积极投入救亡运动。翌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在进步同学王贵爱介绍下，他满腔热忱地参加了救济难民工作。同年九月他回到学校，主办了抗日救亡墙报，参加了开封“九·二八”游行示威，并和校内进步师生一起组织了“怒吼歌咏团”。当时河南大学的学生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都参加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日寇大举进犯，难民流离失所，使他不愿在学校苟且偷安，振奋人心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节节胜利，激励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同年，他和同乡杨飞等同志，在“民先”队组织下，冒着政机轰炸轰炸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此后，由黄敬同志(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率领离太原，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刚刚解放的河北省阜平县，他和同志们一道发动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发展武装力量，展开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他经佟磊(解放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吴旗峰(抗战中牺牲)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考虑到他是在“民先”组织下坚决参加革命斗争的，所以没有候补期，即吸纳为正式党员。从此，他革

命热情更加高涨，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先后担任过当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唐县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唐县党组书记兼民众教育馆馆长，平山县县长，晋察冀边区第八专员公署专员、党组书记。当时冀中平原敌人频繁“扫荡”，斗争异常严酷，环境极其艰苦，他不畏任何艰难，忘我拼命工作。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工作成绩卓著，受到边区第四专员公署通令嘉奖，边区政府两次通电表扬，被称为模范县长。但是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他的身体健康却每况愈下，经常发低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1940年他在一次各县县长会议上正在讲话时，突然大量吐血病倒了。可是当他病情稍缓，即又带病坚持工作。1946年不幸发现又患了严重的脊椎骨结核，使他不得不在石膏床上躺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病魔的折磨和身心的巨大痛苦使常人难以忍受，但是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终于摆脱了死亡的边缘，又投身于革命工作。

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秘书处专员、秘书长，“三反”运动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城市规划处长，国家建委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他把全部精力和知识投入到第一个五年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去。在工作中日夜操劳，出谋划策，讲究科学，注重实效，对我国城市基本建设计划的原则、方法的制定和第一个五年基本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战争年代饱尝艰辛积劳成疾，和平时经常加班加点忘我工作，1958年不幸病逝，享年仅42岁。他一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无私无畏，爱憎分明，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作风正派，言行一致，严于律己，关心同志，受到领导的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他勤奋好学，广读博览，常手不释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文字水平，因此经常受委托起草工作总结报告，为领导拟讲话稿。他还多次为报社写社论等文章，而稿费用于给同志们订报刊杂志，在病榻上还嘱咐把他的稿费交党费。同志们都讲他博学多才，可惜去世太早，党失去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很大损失。领导和同志们送给他挽联，既表达了对他的深切的怀念，又对他革命的一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品质纯洁，对党忠诚，心地坦率，能识大体，是我辈之楷模。

念年斗争，艰难百练，将臻成熟，遽遂逝世，为同志所悲悼。

——编者注：本文作者石磊，为蓝田的革命伴侣，1938年与蓝田结婚，生育一男二女，现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顾问。

# 国民党漳浦县党部的演变

陈育嗣

国民党在漳浦的党务活动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国民革命军入闽，随军而来的本县鹿溪桥村人胡剑平出面筹组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一个月后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派杨纯美（印尼华侨）、何元良（当时为官浔小学教员，后在厦门从事工商业）为漳浦临时县党部筹备员，后来临时省党部又派共产党人郑林英等人来主持临时县党部。翌年政变“清党”，郑林英等出走，临时县党部改组等情况，《漳浦文史资料》前辑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说。

福建的“清党”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四月开始，十月结束。“清”了党，来了派，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一直闹人事纠纷，党务停顿。到翌年十月成立第一届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后还是纠纷迭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七十五次中央常委会决议，令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立即停止工作，由中央派员筹开全省代表大会。随即派驻闽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为全省代表大会筹备专员。又逢到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国民党中央将蒋光鼐撤职。这一段期间，由于省方人事未定，党务停顿，县里也就没有党务可言。当时漳浦县党部由陈修祖、陈达元、卢德明、陈雨苗、陈及峰等人负责，没有发展党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以中央委员林森、杨树庄、方声涛、丁超五、张贞、曾仲鸣、戴愧生等七人为福建党务审核委员，派出特派员到福建省执行党部职权，派了各县负责人。漳浦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以卢德明、陈修祖、陈雨苗等三人为执行委员，杨连元为监察委员，并以卢德明任党务指导员（后改称书记长）。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漳浦县长吕思义与卢德明不睦，卢指吕“勾结共产党”，吕骂卢“搞卢德明党”。彼此势不两立，结果两败俱伤，一九三九年，两人同在一个月内先后调离，这出丑剧才告收场。

卢德明去后由黄慕周接任书记长。黄是“C、C”分子，而漳浦是“复兴”势力范围，因而他行不通，没几个月就离职，旋由省党部派许元瑜接任。（时为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九三九年），许元瑜本名许守忠，原籍龙溪县（即

漳州市）。早年与陈达元、陈修祖、卢德明有结拜之交。在接县党部之前，曾经在龙溪、漳浦一带搞农会工作。当许元瑜在漳浦得势之时，有一个“C.C”控制下的小报《前哨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机关报，厦门沦陷期间该市党部在海沧，该报社社址也在海沧）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对许元瑜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本是“异党”，十九路军“闽变”时在漳州出过风头的。据知情者说，他早年毕业于漳州的福建第二师范学校时，在共产党领导下于漳州北乡干革命工作。后来任《回风报》记者。《回风报》是陈祖康办的，陈祖康曾是中共闽南党组织声讨过的叛徒。在漳州办《回风报》时据说以第三党人面目出现。“闽变”时参加十九路军的“人民革命政府”工作，出任漳浦县长。闽变失败后归于国民党。许元瑜也于闽变时在漳州为“人民革命政府”奔走呼号，闽变失败后“自新”。从他接任书记长起，对镇压共产党不遗余力，如策划蔡围叛变；亲自随同一五七师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等，“剿共”有功，受上级奖赏。

许元瑜是“军统”骨干，后台有陈达元撑腰，漳浦是陈达元故乡，许元瑜更加有恃无恐。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漳浦县三青团等各处成立，筹备处主任杨拔萃同是陈达元亲信。许元瑜又以“党大哥”地位，亲自参与筹备工作。这些陈达元亲信们构成的“复兴”派势力左右了漳浦的国民党统治，这些权势人物以许元瑜为老大哥，不可一世。当时“C.C”系如林列、陈阳山等，凑在漳浦争一地盘，感到十分困难。个别“C.C”份子稍一露面，无不遭到许元瑜的棍棒打击。有一年，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县政府邀例“祭孔”。祭后在孔子庙大排筵席，邀请几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赴宴，美其名曰“尊师”。而实际赴宴的十之六、七为党、政、军、警及各机关的头面人物。许元瑜在筵席上已喝得昏昏然，但余兴未尽，再三强迫一位姓卢的教师猜酒拳，目的是想当场揭出姓卢的丑。姓卢的被迫不过，说了一句“猪八戒，一年死几个臭头注定着”。这是一句俗语，他只是脱口而出。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因为平时很多人都在背后骂许元瑜为“臭头仔”，这一句话竟然当众在他面前说出来，真是惊天动地，所有的人个个瞪大了眼睛。许元瑜故作镇静，而脸上青筋暴露，恨不得一口把姓卢的吃掉。当时漳浦人人知道，许元瑜头上没有几根毛，当然也和阿Q一样忌讳“光”、“亮”等字眼，何况姓卢的投靠“C.C系”。许元瑜早有所闻，正要寻找机会下手，今天当众被辱，简直火上添油。不久，姓卢的“学担”丢了。此后一举一动都有一根无形的“棍子”，在他头上晃来晃去，使他处处“碰壁”。此中的奥秘，不言而喻。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漳浦全县首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百余人。这次大会主要选举执、监委。结果选出许元瑜、柯汉扬、徐晓峰、徐松卿，王慕惟等五人为执行委员；陈雨苗为监察委员。另有二名候补执委和一名候补监委。许元瑜任书记长，陈雨苗任常务监委，柯汉扬任秘书。县党部原有宣传，组训两个股，选举后增设总务、社运(管社会团体)、妇运(管妇女团体)等几个组。基层组织从原有十几个直属区分部发展到廿多个区分部。选举前全县党员数只有数百人，到选举时已有一千多人。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凡是现任公教人员必须一律加入中国国民党，否则，解除公、教职务(六禁为此)。因此一、二年内党员数激增，区分部组织几乎遍及全县各乡、镇、保。个别乡镇如绥安、旧镇、杜浔、赤湖、佛昙、官浔、石榴等地都设有区党部(各辖十几个区分部)。这一年，许元瑜严重肺结核，无法理事，把书记长职务报请由柯汉扬代理。翌年(一九四五年)许元瑜死，柯汉扬正式升任书记长。当时抗战已经胜利，国民党为蒙蔽视听，宣布实施“宪政”，各县相继成立“县参议会”。又为缓和党团斗争，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于事长改称副书记长。柯汉扬乘机参加“省参议员”竞选，中选后去福州开会，又宁选为“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从此常驻福州。本来县党部工作应由副书记长负责，但副书记长陈秀揆预感国民党这条官途已不亨通。所以不感兴趣，改去担任道周高中校长。柯汉扬就向省党部推荐一向拥护他的执行委员丘德修为副书记长，并将自己调离漳浦去漳州市党部工作的一名干事请调了回来，目的是要替他看管这份“家业”。可是不久国民党中央宣布“还政于民”，各省、市、县党部一些事务(如管理人民团体及社会工作等)移交政府办理，实行大幅度裁员。又由于对党员的组训工作名存实亡，县党部成为空架子。县党部常没有人办公。原来地方闹派系(“复兴”与“C.C”)的斗争，也逐渐转化为派中之派的争斗，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选灾”。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副书记长陈秀揆之妻邵惠君被人枪杀，就是宗派争斗的一出丑剧。自从实施“宪政”之后，“选灾”不断，闹得漳浦乌烟瘴气。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福建省党部、国民党省政府开始撤逃台湾，命令各县党部立即销毁档案，人员全部随军撤退。柯汉扬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他受省参议会议长丁超五的影响，于七月间回漳浦，召集心腹数人密商“何去何从”问题。並当场宣布：省党部已批准自己辞去书记长职务，同时推荐邱德修接任。九月漳浦和平解放了，漳浦县党部随着国民党的惨败而“寿终正寝”。